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87.11.15/0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七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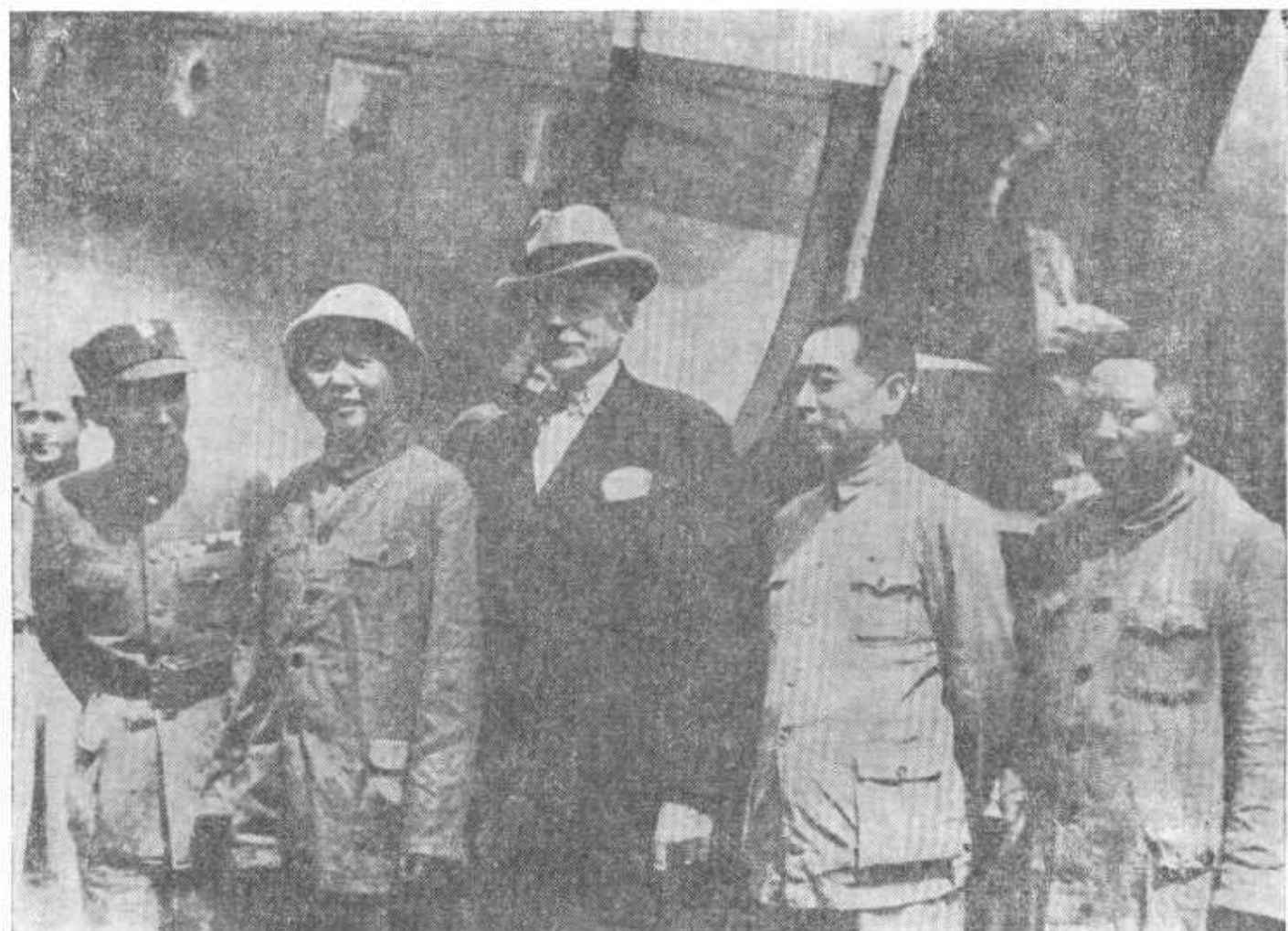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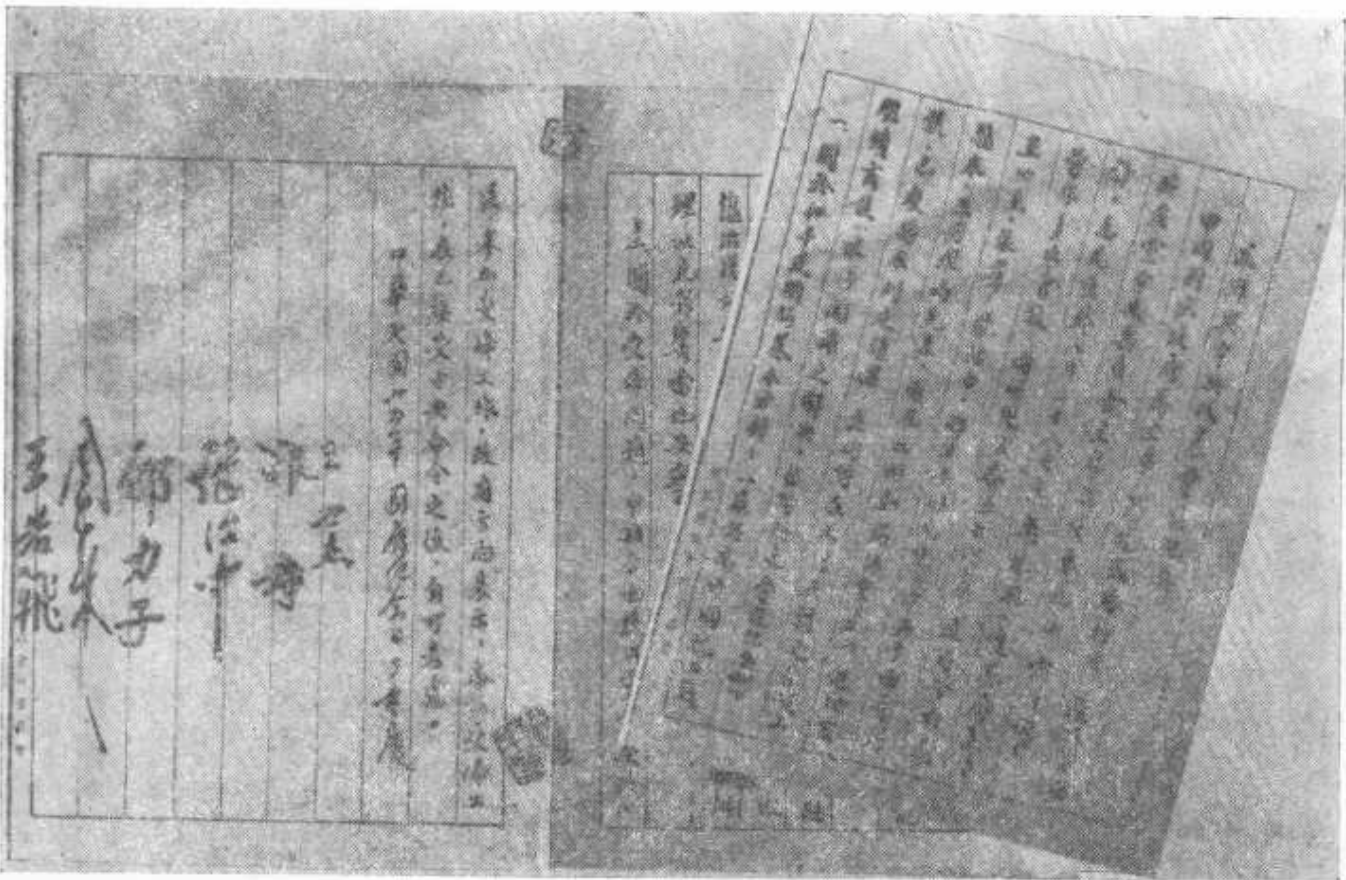
1 9 8 0 年 6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内 部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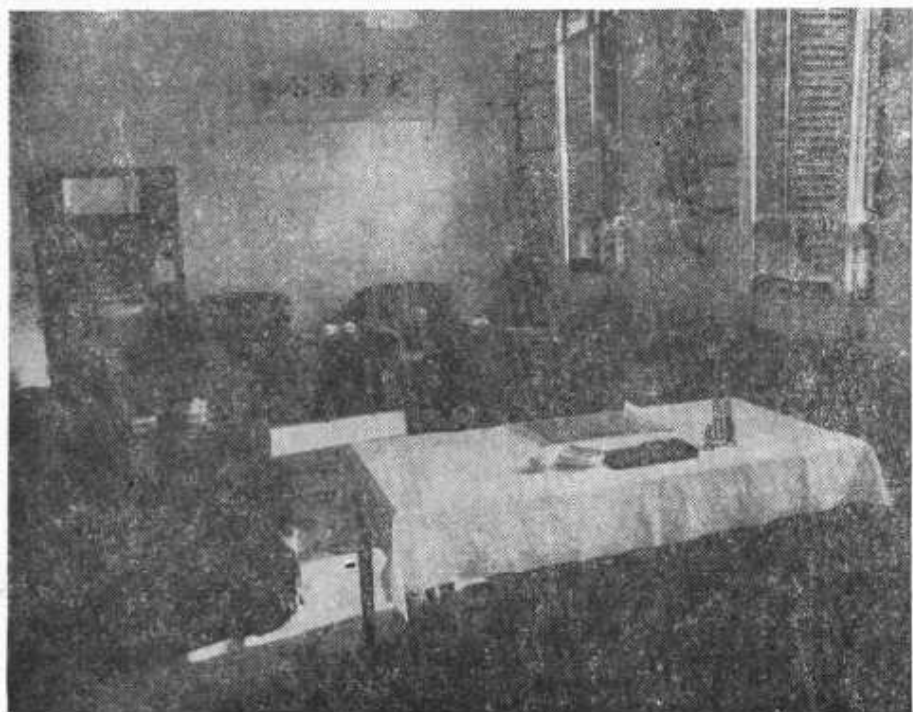
定 价：0.87 元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决定派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前往延安迎接，八月二十八日同机飞抵重庆，在九龙坡机场下飞机后合影。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张治中先生寓所——“桂园”，共同签署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桂园”客厅。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此广泛会见过中外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著名的《双十协定》就是在这里签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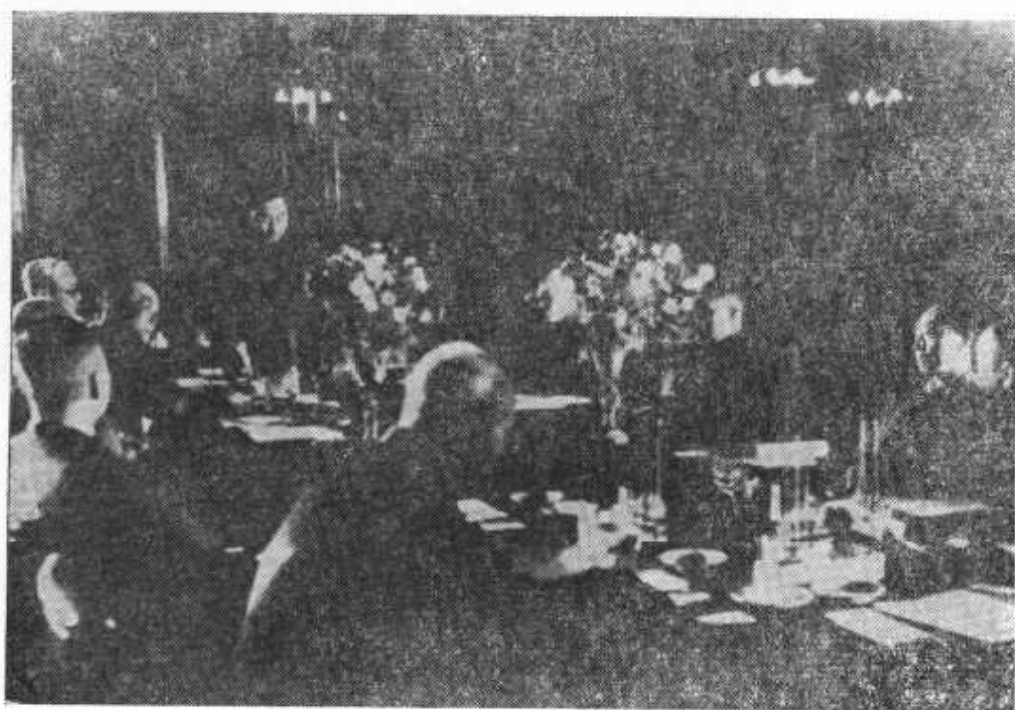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签署军队整编及统编方案。周恩来同志在整军方案上签字。

张治中先生在整军方案上签字。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马歇尔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机场迎接。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目 录

我与中共	张治中 (1)
------------	-----------

第一章 北伐前后	(1)
----------------	-------

一、两党合作	(1)
二、黄埔斗争	(1)
三、蒋周关系的恶化	(2)
四、北伐到了武汉的分裂	(3)
五、出国游历	(5)
六、军校十年	(6)
七、西安事件	(6)

第二章 抗战期间	(7)
----------------	-------

一、初度和谈	(7)
二、主政湖南	(9)
三、入川后——两党斗争的风雨	(10)
四、文化工作委员会	(11)
五、两个聚会	(14)
六、战干团事件	(16)
七、皖南事件	(17)
八、二度和谈	(19)
九、三度和谈	(21)
十、美方调停	(35)
十一、和苏使谈中苏关系	(43)

第三章 抗战胜利以后 (47)

- 一、迎接毛主席来重庆——到延安..... (47)
- 二、《双十协定》..... (53)
- 三、欢宴毛主席..... (58)
- 四、二到延安..... (61)
- 五、由新疆发寄反对内战万言书..... (62)
- 六、马歇尔到了中国..... (64)
- 七、政协前后——整军方案的签定..... (65)
- 八、三到延安..... (76)
- 九、东北停战..... (77)
- 十、再回新疆..... (77)
- 十一、马歇尔回国——下“戡乱”令..... (78)
- 十二、机密建议..... (82)
- 十三、会见罗申..... (83)
- 十四、低气压的南京..... (87)
- 十五、兰州小住..... (89)
- 十六、西安谈话..... (95)
- 十七、南京谈话..... (101)
- 十八、孙科组阁..... (103)
- 十九、元旦文告——蒋下野..... (104)

第四章 北平和谈 (106)

- 一、忽想退保西北..... (106)
- 二、溪口盘桓..... (108)
- 三、何应钦组阁..... (112)
- 四、和谈腹案..... (113)

五、顽固派的压力·····	(115)
六、再到溪口·····	(117)
七、飞到北平·····	(118)
八、一次会议·····	(124)
九、二次会议·····	(142)
十、南京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	(166)
十一、对时局的声明·····	(171)

第五章 自我检查 ····· (174)

一、我怎能接近、同情共产党·····	(174)
二、和共产党交往关系中，正确与错误之处·····	(177)
三、两项主张和立场问题·····	(185)
四、从近望到远·····	(189)

我 与 中 共

张 治 中

本文系张治中先生遗作《七十回忆》的一章，原题《我与共产党》。现经征得张先生亲属张一纯同志同意交本刊发表。——编者

第一章 北 伐 前 后

一、两 党 合 作

一九二四年春，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候，孙先生已决定遂行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如毛泽东、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林祖涵、张国焘、于树德等都是中共党员。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共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

二、黄 埔 斗 争

同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是过从较多的。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

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属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等事件。跟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讨论的。）

三、蒋周关系的恶化

蒋和周恩来的关系日趋恶化，我虽然常常从中调解，终无效果。一九二六年，决定了北伐大计，蒋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部，派我充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并对我说：“你先权充副官处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这时我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恢复两党合作。蒋说他准备要邓演达充任。我说邓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为最适宜。但蒋终不同意，最后表示周可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我又转过头来劝周，但为周所拒绝。我认为周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当时极不以蒋的态度为然。同时我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而且也是促成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解放后周恩来先生曾和我谈起这一段往事。

四、北伐到了武汉的分裂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不久就到了衡阳。有一天晚上，我送蒋往长沙，在船上和他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蒋只是接连几声“嗯”，没有具体答复。到武汉后，两党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更趋激烈。有一天，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意很锋利的说话，更增加了我对两党合作前途的极大焦虑。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这时，蒋已派邓兼总部行营主任，驻在武汉，并发表我为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新成立的学兵团团长。

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蒋率领大军进驻南昌。记得是一九二七年元月，蒋第一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就首先指斥邓演达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我当时还没体会到他将会对我提出处理邓的办法，急忙为邓申辩，说这是邓一时冲动，

只要他能约邓一谈，自可冰释。力主他约邓来见，并且还劝了蒋很多的话，蒋问我：“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我连答“是。”

回到武汉，邓已揣测我到南昌的经过，就到我家说：“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我很坦白地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能到南昌和他谈一谈，一切都可以冰释。”他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他的话一出口，我便知道问题是僵了。当时在武汉军分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他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蒋的不是，意思是要我公开表示反蒋。我告诉他：“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并且把拟好的电报给他们看，他们看了说：“你的电报可以发，但没有多大的作用。”那时候，他们认为我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而劝蒋的。当然，这也是事实，我自己也并不否认。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两者之间，挤在夹缝里。这一段时间，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

同年三月中旬，蒋第二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劈头就对我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产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只给你们使用。”我看他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抗辩无用，便姑且答应他：“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取得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我打了一个电报给邓，便随即回到武汉来。一见面邓演达和我说：

“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武汉克服后，便成立了武汉政治会议。）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便也动了点感情答复他：“我不能向政治会议辞职，我不是它管的，我愿意辞，但应该向蒋总司令提出！”他说：“好吧，你写电报。”

我当时就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给他，事后知道他并没有替我拍发。我既决心辞职不干，便召集全体学生告别。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幕，在我把辞意告诉他们后，他们苦苦挽留，群情激越，其中多有痛哭失声者。但我还是坚决要走，并且用许多话说服了他们。

五、出国游历

告别后，便坐船一直到了上海，记得是四月中旬的光景，先看到了蒋，有很多人在座，陈铭枢是其中之一。蒋说：“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我当时满腔苦闷，未置一词。当我离开武汉后，我就决心摆脱国内政治生活，到国外去学习。到上海时，我把这意思向蒋说了，他坚决不许，要我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事宜的训练处。等我刚把这个训练处组织完成，蒋下野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赶办结束，积极准备出国。

在出国前，我到溪口去过一次，住了一星期，我对蒋指出了他过去种种的缺憾，如对共产党问题，对第七军问题。我的看法还是和北伐时在湘江轮船上和他谈的一样。

在出国之初，我本来预定一个考察和学习的五年计划，但是还不到五个月，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要我回国参加北伐军事。我没办法，只好匆促地从欧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夏天。

回到南京，北伐大军已经克服北京，奉军被迫退出关外，局面发展是迅速的，但是两党的僵局始终没法打开。这种情况，对于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次游历受了一些刺激，它使我的思想起了若干的变化。一方面看到人家科学与工业及种种现代化建设，羡慕不已；同时也看到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愤愤不平，并慨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因而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的境地，使国家重复扬眉吐气于国际坛站之上。这种思想根源，

似是一种以民族本位做出发点的国家主义思想，只看到国内外问题的各种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它的症结所在。这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显然是开了一次倒车！

六、军 校 十 年

由于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的侵入，一面加深了我对两党磨擦的厌恶，一面也决定了我今后半生的路向。当时我想，我是个军人，富国谈不到，强兵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回国后除了担任短短三月的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外，即主动请调到军官学校服务。这一转变，使我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一九二八秋——三七春）军事教育生活，并且以它作为闪避两党斗争底风暴的安静地带。因为我在军校的十年，恰好是两党打得头破血流难分难解的所谓“十年剿共”期间，而我总是毅然决然地置身事外。不过这一时期，我又曾五度出绶兵符，就是以武汉行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以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之役。除后两次是对日抗战外，前三次还是内战（我当时的看法是共不应剿，逆者当讨，现在看，当然是一种矛盾而又幼稚得可笑的糊涂观点）。不过都与中共无关，而且每次战事告终，就立刻缴“令”回校，避免参与反共战争。

七、西 安 事 件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件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谁都知道，蒋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南京，与中共当时的决策有重大关系。因为中共当时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迫，大敌当前，内部不容分裂，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力劝张学良、杨虎城放蒋回去。在今天看，这一着实是中共伟大英明的决策，也是以后他们步步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

试想，假使当时张、杨直置蒋于死地，国内势必陷于群龙无首，土崩瓦解的混乱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也势必趁火打劫，大举来犯，那末国家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事件发生之日，我正在苏州部署抗日军事。何应钦在电话上告诉我，并约我回南京商议所谓“讨逆”军事。我当夜回到南京，当时他们打算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其中一路希望由我指挥，但是我反对，我认为这件事只应该用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任何条件求得解决。但是当时同意我的意见的仅少数几个人，大多数都不以为然。

这次事件，是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促使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仅仅过了半年，当“七七”芦沟桥事变一起，国共两党就马上恢复了合作关系，当时我正在宁沪一带继续部署抗日军事。

第二章 抗战期间

一、初度和谈

为了恢复合作，双方曾派出代表商谈，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国民党代表是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商谈结果，中共草拟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件，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对外公布。宣言提出中共奋斗的总目标三点：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迅速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恢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